

陈惇自选集

励耘文库
张健主编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陈惇自选集

励耘文库
张健主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惇自选集/陈惇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7. 1

(励耘文库/张健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29 - 2627 - 5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文学研究 - 中国 - 外国 - 文集
IV. I0 - 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2567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8.75 插页/5 千字/394

定 价 28.00 元

总序

木铎金声，中文百年。早在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之始，“国文”便被列为学科建制的首要门类。1908年，师范馆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，延聘的教师多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。1912年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，设立了国文部和国文专修科。1923年，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，改国文学部为国文系，并增设了国文研究科。及至1931年，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之后，又建立了文学院，下设国文、外文、历史三系。

历经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，北师大中文学科广揽英才，一时风云际会，鸿儒咸集，不仅成为全国中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核心之一，也跻身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与学术思想重镇的行列。

大学乃大师之谓。百年以降，不胜枚举的大家名师荟萃北师大中文学科，杏坛执鞭、弘文励教。昔有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黎锦熙、沈从文、沈兼士、顾随、余嘉锡、吴承仕、黄药眠、钟敬文、谭丕模、穆木天、叶丁易、刘盼遂、李长之、李何林、陆宗达、萧璋、俞敏、启功诸先贤会通开新，彪炳史册；今有郭预衡、聂石樵等一大批学高身正、享誉学界的后继者笃信精勤，骞翮远翥。这些上下求索的前辈学人，不仅用智慧与辛劳、学识与著述，也用他们的人格与情操，共同铸造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百年辉煌。

学术当为大学的“立身之本”。北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常葆生机，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不无关系。上世纪30年代，北师大成立国学研究所，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就曾中肯地告诫道：大学者，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，学术实乃师大之生命线；倘若学术不兴，则师大终将不能成其为“大”。

近现代时期的北师大,其学子多出寒门。生活上清贫朴素,学业上质朴自励,刻苦攻读、勤奋治学、务实严谨,蔚成风气。北师大过去曾有四字校训,曰:“诚”、“敬”、“勤”、“朴”。诚笃力行谓之诚,敬业乐群谓之敬,勤勉奋发谓之勤,实事求是谓之朴,精辟概括了北师大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气。而其中,“诚”、“朴”二字,更是百年师大中文学科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。

笃实求真而不务虚华,质朴勤勉而锐意进取;朴学与创新兼容,学术与思想共济;既捍卫学术家园,又保持现实关怀;既恪守育才与“树人”之宗旨,又积极担当中华文化建设之大任。百多年来,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,无论历经怎样的变迁,北师大中文学科以“诚朴”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始终不曾断绝,薪尽火传般代代相承至今。

当今时代,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人们从生存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。大学在迎来空前机遇的同时,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身处精神追求有可能被物质欲望所“悬置”的社会文化语境,失去轰动效应的中文学科,不得不面临一连串严峻的话题——中文学科的发展,如何面向当今的时代?与时俱进的革新诉求,如何不被浮躁、功利的世风所裹挟?“诚朴”的学术追求与引领社会文化的重任,如何在喧嚣中传承、坚守?

有鉴于此,北师大文学院组织出版了《励耘文库》这套自选集系列丛书。在某种意义上,它们可视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前辈学人们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回答。丛书作者均为本院成果斐然、卓有建树的专家教授。这些现已离退休的前辈学人孜孜矻矻、忘我耕耘,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清苦与执著诠释着“诚朴”之精义,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

毕生的心血。丛书所收录的论文,均系作者自选的代表性作品。这些写作于不同时期、关注不同论题的学术文字,不仅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欣然回顾,也以浓缩的方式集萃了作者精深的学术思考和卓著的学术成就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一篇篇浸透着学识、睿智、思想与操守的文章,负载着传承百年师大优良传统的使命,见证了当代学者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与学术情怀。

这套丛书建构了一方精神守望者的家园。在这里,一群甘于寂寞的思想者,用执著与静思来面对飞逝的岁月和骤变的时代。他们身处喧哗之中,追求的却是潜心向学之中心灵的沉静。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,但他们却享受到了精神的富足。作为百年师大中文学科悠久学术传统的又一批“代言者”,他们以其传承和光大中国文化的热望,以其诚信质朴、不懈求索的精神,为后学者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楷模。

先师鲁迅尝言:“人多是‘生命之川’之中的一滴,承着过去,向着未来。”在文明传承和学术进步的链条中,这套丛书的著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是为序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张健

2006年7月7日

自序

2006年,正是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五十周年。在这个时候,文学院领导决定出版《励耘文库》,由老师们自选文集。听到这个消息,不由得思绪万千,百感交集。这本是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,我由衷地感激。同时,我觉得,这又可以看作一个善意的指令,给我们一个回顾自己的机会。对我来讲,值此五十周年之际,也是该做回顾的时候。不管你想不想,这个念头时不时就会出现。然而,真的要回顾起来,一时头绪繁杂,要想的事,该想的事,甚至平时不大留意的事,都会涌上心头,实在太多了,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说,可以在序言里回顾一下自己在专业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,那么就从这里说起吧。

回想这些年来自己走过的道路,可以用一句话概括,那是一条“选择——摸索——再选择——再摸索”这样反复曲折的道路。所以,如果给本篇序言取一个题目,那就是《选择和摸索》。

这几年,我有机会参加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团的工作,经常去听课。有一门课叫“大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与发展”,老师在课堂上指点学生如何根据主客观的条件来规划自己的一生,选择自己的前途,制订一个行动计划,既有长远的,又有近期的,一步一步地奔向自己的目标。我听了,非常羡慕今天的大学生:他们能够自己来选择专业,自己来把握前途,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回想当年的我们,脑子里就没有这样一根弦。其实我也知道,今天和当年,那是两种环境,两种理念,也许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我只是蓦然出现这么一种感慨。然而,在脑际却随之浮现出一个个对自己的反问:我曾经有过人生规划吗?我怎么会搞起外国文学来的呢?后来又怎么搞起了比较文学呢?那是我自己的选择吗?

说实在的,在大学毕业之前,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与外国文学结缘。因为从中学时代起,我就喜欢中国现代文学。那是受到几位语文老师的影响,是他们启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,特别是对现代文学的兴趣。记得上初中时,有一位语文老师是绍兴人,她讲起鲁迅的作品来十分传神,加上她那口绍兴味儿的普通话,把作品里的人物和环境讲得出神入化,每每把我们带进了鲁迅的世界。我们仿佛来到了三味书屋、百草园,来到了土谷祠、赵举人家,而阿Q、小D、孔乙己、祥林嫂、假洋鬼子等人物,也都深深地印入我们脑海。从此,我对鲁迅着了迷,凡见到有关鲁迅的书,就必定找来看看,不一定都看懂,但就是爱看。高中毕业时投考北师大,除了当老师的想法之外,主要是冲着中国文学去的,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与外国文学结缘的机会。

到了大学三年级,我们开始学习外国文学。也就是从这时开始,我与外国文学结了缘。给我们讲课的是穆木天先生。对于穆先生,我们早有耳闻,不过,当时我是从现代文学的角度来了解他的,知道他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、五四时期的诗人,却不知道他在外国文学方面的造诣。听穆先生的课,开始只觉得有意思,好玩儿,因为他喜欢说笑,从不板着脸讲课。讲希腊神话,说到这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的艺术,如何显示其永久的魅力,穆先生会放下稿子,话题一转,说到某某教授新近老来得子,婴儿如何可爱,一家人仿佛都返老还童,学着儿童腔来逗孩子:人人都保留着自己的童心和对童年的美好回忆。起先,我把这些当笑话来听。后来,听着听着,觉得其中另有深意。他是在笑谈之中,引导我们去理解马克思关于希腊艺术的那番评价。半个学期之后,我有了一种感悟:穆先生不仅是教给我们外国文学知识,而且在教

我们如何去分析文学现象。那时刚解放不久,大家都知道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文学,但是究竟怎样做,却很茫然。穆先生的课给我们做出了示范。中世纪的欧洲文学头绪纷繁,他用两种文化的观念来分析,果然眉目清楚。其中关于市民文学的分析,更启发我们去认识明清时期中国文学的类似现象。他讲拜伦,说到诗人的反抗精神与当时欧洲如火如荼的民族民主运动的联系,更让我大开眼界:原来从一个公子哥儿的作品中可以发掘时代精神以及它的来源。于是,我开始喜欢上穆先生的外国文学课了。我觉得学习外国文学不但长知识,还可以长能耐,从根本上提高自己。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学习外国文学的门径。我把这些体会写成一篇稿子,发表在班级的黑板报上。那年我的外国文学成绩也不错,记得是九十几分。也许就是这两件事让穆先生注意到了我。

第二年,教育部决定在师大中文系办一个全国性的俄罗斯苏联文学进研班,由苏联专家主讲。有一天,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找我,告诉我组织的决定:提前毕业,在外国文学教研室工作,先参加研究班学习。我感到很突然,没有一点思想准备,因为我一心一意向往现代文学,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。但是,那时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,我只得放弃自己的喜爱,接受组织的决定,当然外国文学我也是喜欢的。就这样,组织之命,书记之言,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。如果说到选择的话,那是外国文学选择了我,不是我选择了外国文学。

走外国文学之路,对我来讲,几乎是从头开始,要学外语,要看大量的作品,要学习世界历史等等,比学习中国文学难处更多。本以为有个好导师,可以按部就班地学起来,因此对前途并不担心。谁知道紧跟着

来了1957年的“整风”、“反右”，穆先生被打成“右派”。我们失去了导师，只得靠自己摸索了。然后又是1958年“教育大革命”，“拔白旗插红旗”，翻天覆地般闹了起来。当时教研室只有几个年轻人，教学任务和教育革命的重担落到了我们身上。那时，在全国“大跃进”的形势下，我们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，凭着一股冲劲就干了起来，还说要“白手起家”，搞出无产阶级的外国文学教学体系。回想起来，大家的干劲真不小，不分白天黑夜地查资料，翻书本，居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搞出一套参考资料，一份教学大纲，开出一些新课。

不能说那时的工作一无是处，对我来讲，最大的收获是把外国文学从头到尾地摸了一遍。问题在于这些急就章并不是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，有许多过“左”的东西。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搞下去，前景堪忧。幸好后来中宣部抓了文科教材编写工作，由北大牵头，几个单位合作编写外国文学史教材（其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《欧洲文学史》）。我作为师大派出的人，参加了编书的全部过程。我那时无人指导，要参与这样大部头的文学史的编写，真不知如何对付，而参加编写组就等于上了一个培训班。编写工作从制定大纲开始，到最后成稿，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个人起草、集体讨论、主编定稿的过程，一章一节地进行，一章一节地过。在讨论会上，老先生的发言往往语焉不详却切中要害，每当听到精彩的地方，我茅塞顿开。因此，不论是编写还是讨论，都是极好的学习机会。如果说我当初搞大纲编资料，是粗略地了解了一下西方文学的大概，那么通过编书，我才真正在专家的指导下，踏踏实实地把西方文学从头到尾地学习了一遍。冯至先生、杨周翰先生，还有许多参与工作的先生们，带引这支队伍，走着一条扎扎实实搞学术的道路。他们严

谨的学风和对后辈的关怀,我看在眼里,暗自视为自己的榜样。应该说,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作风上,我受到了全面的培训,其收益终身难忘。

经过这一番“培训”,我感到自己扎实了,也踏实了,具体的收获就是在60年代我们教研室编写外国文学新教材时,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。谁知好景不长,紧接着来了“反修”运动。外国文学成了“封资修大杂烩”,首当其冲。我们刚刚稳定下来的教学方案被彻底否定,教学要以批资批修内容,步履维艰。再后来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,教学科研一概停顿。

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回顾这十年,我觉得,走外国文学之路虽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,但是并没有错。抓住一切机会,通过边干边学的道路,摸索着走路,同样可以有所长进。只可惜我时运不济,刚刚有点起色就被迫搁浅了。

文革结束,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。我的现代文学梦也死灰复燃,很想趁此机会换一换专业。于是,我面临着又一次选择。但是,事情还是不由自主,组织上命令我回外国文学教研室。又是外国文学选择了我。当然,这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工作经验,干起来还算顺手。从本科生教到研究生,从基础课教到专题课,从校内教到校外,广播电视,自学高考,忙得不亦乐乎。但是,忙碌之中,有一个问题始终盘旋在我的脑际: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,“中”与“外”之间如何协调?解放前,中文系称为国文系,专学所谓“国学”,不学外国文学。解放后,学习苏联,中文系增设外国文学课程。从培养新时代学生的需要来看,他们的知识结构应该适应新的现实,有必要学习外国文学。但是,中文系的学生

究竟怎样来学习外国文学,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应该有什么特点,外国文学怎样与中文系的其他课程结合,形成有机的整体,这些问题处理不好,外国文学势必游离在中文课程之外,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加物,有人说是“小菜一碟”,有的系领导把它看成累赘。我很希望能找到“中”与“外”的契合点。另外,我总觉得自己的根是中国文学,后来才学了外国文学;我的强项是“中”,不是“外”,可是又属于“外”字号,不能脱身,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,也许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。我也在寻找自己今后的学术道路。从规划人生的意义上说,我似乎有了选择的自觉性。

1980年,我参加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成都举行的第一次年会。那是“文革”之后外国文学界的第一次聚会。在会上,见到了许多久违的老前辈,十分高兴,更有意外的收获:在会上,听到他们介绍一门新学科——比较文学。有的老先生谈起比较文学来兴高采烈,眉飞色舞,甚至当场招呼大家成立比较文学学会。那时的情景真可谓一呼百应,群情激昂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一群温文尔雅的学者群中出现如此热烈的场面。那次会议使我豁然开朗。我觉得,比较文学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中外文学的契合点,它可以解决上面我所思考的问题,它能在中与外之间架起桥梁,它是帮助我身上的两个根结成连理的红娘。于是我决定:走比较文学之路。这是一次与以往不同的选择,因为再不是人家选择我,而是我主动选择了它——比较文学。也许是缘分,也许是机遇,一门我完全陌生的学科,居然刚刚听说就如此倾心。当然,我也想到,这样的选择之后,我又要从头做起,又要开始一个新的轮回,摸索着前进。

回校后,我与外语系的两位老师一起给学校打报告,建议开展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。后来,黄药眠教授也写报告给学校,提出同样的建

议。1982年,学校决定成立跨系的比较文学研究组,黄先生担任学术指导,我担任组长,另有五位教师参加。新一轮摸索就这样开始了。起初,大家对比较文学只有一腔热心,而对这门学科本身却一无所知,也没有现成的书籍可以参考。我们只得拿出当初白手起家、边干边学的旧招,从找资料开始,着手摸清学科的基本面貌。研究组成员的优势是英、法、德、俄语种齐全,于是,大家发挥自己的特长,分头准备,定期汇报,终于在充分讨论、集思广益的基础上,摸清了比较文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,整理出五个题目:比较文学的定义、比较文学学科史、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、比较文学的几个特定领域(即后来的“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”)、跨学科研究。大家为自己的努力成果而欣喜,决定一鼓作气,把它诉诸公众,接受检验。经过半年的准备,我们开出了一门新课“比较文学概论”。尽管这次课讲得很粗糙,却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。为了巩固成果,我们决定编一本教材,再配上一本参考资料,为今后长远的教学打基础。写教材,编资料,工作难度增大了,我们把它看成第二轮学习,在摸索中前进,成果就是后来陆续出版的《比较文学研究资料》和《比较文学概论》。

搞比较文学要比搞外国文学难得多。搞外国文学,前人的积累多,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接受。比较文学则不然,它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,甚至连个公认的定义和定型的体系都没有。它涉及两国以上的文学现象和许多其他学科,还有种种复杂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,干起来又费事又费心。初涉之时,凭着一知半解和一股热情就干了起来,潜身下去,才知其中的深浅和艰难。有时我也会出现消极念头:我真是自找苦吃!搞外国文学,干起来得心应手,何必

去搞什么比较文学！但是，我越往深里搞就越明白，在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的人走比较文学之路，那是完全正确的。你不走，别人迟早也会走。你今天不走，明天想明白了就会走。所以，这一步走得对，没什么可后悔的。事实证明，这个想法没有错。1998年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委员会在修改学科目录时，决定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合并，而且把它的归属从外国语言文学类挪到中国语言文学类，规定它为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程。这就为解决比较文学在中文系的地位和作用指引了方向。

我庆幸自己的选择，但同时又感到，那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。如果说，我们过去主要是呼吁、呐喊，那么现在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做出实绩；如果说，以前主要是学习引进，那么现在需要的是开拓进取。比较文学已经有了一百年多的历史，但是，如何把这样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，如何把它引入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之内，如何把它真正与世界文学相结合，真正成为中文系教学里“中”“外”之间的桥梁，却很少有人涉足。那几乎是一片处女地，有大量开拓性工作要做。单纯的引进并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开出一门新课也仅仅是起步，我们的路程还很长很长。譬如，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份符合中文系本科生教学实际的、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大纲，还没有一本真正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写成的、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总体来加以观照的、比较理想的文学史教材。这些本是最初步的工作，然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。如果想到比较文学与其他课程的结合，那里的空间更是可观。回顾过去的二十几年，我们不过做到了粗浅地了解比较文学，知道了比较文学是怎样一门学科，并没有实现我们引进比较文学的初衷。我们既然已经选择把比较文学移植到中文系，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让它在这里生根开花。

说得更明白一点,既然我们选择了开拓,那么我们必然又面临着新一轮摸索。好在我们有了在摸索中前进的经验,懂得开拓的甘苦,就让我们继续在摸索中前进!

最后,回到这本自选集。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。第一,这些文章说不上什么论文,都是教学的副产品,也可以说是学习体会,而且都是“文革”以后所写。“文革”之前,受当时思想的限制,很少写稿,除非是领导布置的任务。“文革”期间,外国文学不能搞,我曾去学习毛主席诗词,写过这方面的赏析文章。“文革”之后,回到外国文学来,由于教学任务繁重,没时间专门搞科研题目,只是把教学过程中有点体会的地方,挤时间把它写成文字。许多文章就是这样出世的。现在看看,总觉得太粗糙,缺乏创意。可是,那已是既成事实,无法改变,也没有必要改变。这本集子选收了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我曾开过一门“莎士比亚研究”专题课,学生反映不错,我很想把它整理成稿,希望时间从容一点,多看一些材料,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,可是一直没有得空。这次下决心抽出几节,赶写了一些篇什。但是,为了赶上出版日期,那只是匆匆写出的急就章,没能有什么提高。莫里哀是我这些年下工夫较多的一位作家,主要是应几本教材主编之约,撰写了有关章节。当时因字数限制,意犹未尽,这次我也下决心就几个问题,写下了几篇文稿。那同样是急就章。这两个题目,我都有进一步写作的欲望,但愿以后有机会能了却这个心愿。我把全部稿件分为三个部分,基本上可以反映我“文革”后下过工夫的几个学术点。

第二,关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。毋庸讳言,我从上大学开始,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,已经养成一种思维定势,也就是所谓社会的历